

韩石山经典著作

我比前贤路已宽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三晋出版社

我比前贤路已宽

韩石山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比前贤路已宽 / 韩石山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17. 1
ISBN 978-7-5457-1466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韩石山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5149 号

我比前贤路已宽

著 者: 韩石山

责任编辑: 解 瑞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 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总编室)

0351-4922203 (印制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jcbbs.cn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1466-1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小序

承张继红先生的美意，让我有机会出这么一本书。

此书收入的均为近年来发表或出版过的较长的文章，少者万余字，多者数万字，共是九篇。

前面五篇，算是传记，三篇是写自己的，两篇是写别人的。

感谢侯光天、杨文宪两位学长，没有他们策划出版《文坛五同学》一书，我不会写出《既贱且辱此一生》这样的自传作品。

感谢张明旺先生，没有他主持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期间策划出版《山西省作家传略（第一辑）》《山西省文学批评家传略》这两种书，我不会写出《我比前贤路已宽》《一串歪斜的脚印》这样的长文。

最后四篇，是我在四个地方的演讲稿，自认为还有些见地。

先前发表时删去的文字，一律不再恢复，也不再加上什么。

粗略算来，这本书出版时，我该整七十岁了，且以此自寿。

作者

2016年7月27日于景邸

既贱且辱此一生 / 001

我比前贤路已宽 / 088

一串歪斜的脚印

——我的文学批评小史 / 138

林鹏先生 / 157

《李广华传》索隐 / 203

一个在校大学生该怎样练习写作

——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演讲 / 243

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

——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/ 253

在山西，怎样攀登文学这座山

——在山西吕梁学院的演讲 / 270

在山西，该怎样读书

——在山西省图书馆的演讲 / 290

既贱且辱此一生

吾贱且辱……

—— 柳宗元《送薛存义序》

一、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家

先说我的老家吧。要不说什么都像在半空悬着，落不到实处。

我是山西人，老家只会在山西，不会在别的什么上等州郡。依《郡望百家姓》上的说法，韩姓出自“南阳”，可说是南阳韩氏，那是宋代的事，说不定更早。按说我可以说祖籍南阳，想想并不妥当，近世以来，河南的名声比山西好不到哪儿，犯不着为了一个子虚乌有的“郡望”，背上欺宗灭祖的名声；南阳那儿即使是祖，也是远祖，没有近祖亲切。据家谱记载，我家至少自明代起，就在山西南部这个叫韩家场的村子居住了。

韩家场，现在是临猗县临晋镇的一个村子。更上一层行政区划是运城市。若按这个县北边那个叫万荣的县里流传的一个典故，想托大的话，还可以加上更上一层或两层的领导机构。这个典故在我们那一带流传甚广，说出来或许可以加深对我们那一带风土人情的了解。说是一个村干部，听说名头越大，越好办事，而他又是个老实人，不能胡说八道，深思之后，便在自己的名片上印

上这样几句话：“中共中央国务院，山西省委万荣县，村办企业水泥厂，支部书记兼厂长。”

这当然是个笑话，我们这个村子怎么也牵扯不到山西省委，更牵扯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。

有一点却是必须郑重说明的，就是，我出生时，我们这个镇子的规格要比现在高些。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，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。当时这个镇子，是个县城，就叫临晋县。到了1954年，“厄运”降临了，全国大合县，临晋与东边的猗氏合为临猗县，县治设在猗氏，临晋就沦落为镇了。在此之前，它可一直是晋南平原上响当当的富县。而我们那个村子，就在这个富县县城的东关口上，与东关大街只隔一条不会超过十步宽的土路。

东关是旧县城最繁华的大街，说我们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也不为过。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要，要做郑重说明，乃是因为它不光关系到我们村子的品格，还关系到我个人的品格。须知，一个县城出生的孩子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那儿有句俗谚，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此中的道理，说是：“城里的娃娃，乡里的狗。”意思是这两类动物，都是轻易招惹不得的。

我出点小名后，好多人一提起我是韩家场村人，总说我是个乡下人，于是生出许多说法来，或是纯朴，或是颀颀，总之是一个出生在韩家场这么个村子里的人，是不能跟一个出生在哪怕是太原这样重污染的城市里的人相比的，多少会少些文明的熏陶。我听了心里颇不以为然，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懂得中国城乡文化的深奥含义。一个生长在周围都是农村的县城的孩子，其优越感是要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的。前者有可比性，后者没有可比性，可比性最能激发孩子的潜质，至于是好的还是坏

的，那就全看各人的造化了。

说到这里，顺便说一下我的出生。道理同前，只有将这些基本的情况弄清了，往后说什么才能落在实处。不知你留意了没有，刚才说到出生时，我只说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，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，没有说月与日。加上月与日，再说1946年就不妥了。我出生的日子是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换算成公历，已是1947年的1月3日了。上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，看到一本《万年历》，轻轻一翻就查出来了。这是我上了五年大学，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明确的一个收获。

该说这个家庭了。真担心能不能说清楚。好多时候，是说不清楚的。这次也只敢说试试看。最好的办法是从头说起。若在戏台上，是要叫板的，我的叫板该是一声长长的：苦啊！

所谓从头说起，就是从我记事时说起。我不是个多么聪慧的孩子，记事之时，当在七八岁的样子，也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。我这里说的是虚岁，没办法，我小的时候，一直是用虚龄计岁的。

七八岁，也就是1953年吧，清楚地记得，我家大门的门脑上，钉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，比三十二开的书本还要小些，大体说来是四方形，只是上面两个角截了些，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。正中墨写的四个字是：光荣军属。

谁是军人？我父亲。

我见过父亲寄回的照片，好几张。一张是单人的，戴着军帽，正中是五角星，昂首挺胸，胸前的白布胸卡上印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后来父亲跟我说，这是他在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照的，学校校长是后来成了元帅的叶剑英。一张是戴大盖帽

的，胸前仍是白布胸卡，父亲说是1950年部队在太原驻扎时照的。一张是与一个战友的合影，两人坐在舰艇上，上面写着“五四年于长山岛”。经我细细辨认，发现那个舰艇，包括海水，全是假的，像是在照相馆里借用了道具照的。父亲坦然承认，确实是道具。他们是工兵部队，在烟台的长山岛上修筑国防工事，休假日去了烟台在照像馆照的。

不光是军人，还是个小军官。据父亲说，1955年授衔时，是少尉，没过多久就转业了，在德州监狱当管理干部。一干就是三十四年，直到1990年离休。

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家里当家的是爷爷。

爷爷也不是农民。解放前当过小学校长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早就不当校长了，在临晋东关街上，开一间韩记颜料店，捎带也卖铁货。从东关口往里走三四十米的地方，路北，只有一间门面，没有伙计，就他一个人，是老板也是伙计。逢集的日子，在门前的台阶上摆满铁犁、铁铧等农耕用品，在台阶下摆一张单桌，上面摆一排盒子，盛着各色颜料，主要用处是染布。

临晋街上，三六九逢集，规模很大，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。不管集日不集日，爷爷每天早上都要将门前那块地，认真地扫一遍。他扫地的时候，常是我上学的时候，到了爷爷跟前，总有些走不动的意思，磨磨蹭蹭，不想马上走开。每当这时，爷爷常会说：“想吃个火烧吧？”

我也不吭声，只是更加走不动了，直到爷爷掏出五百元钱递给我，这才欢欢实实地走开。1953年正是旧币兑换新币的时候，我有过用旧币的记忆，想来是爷爷给的。再后来，就是五分钱了。五百元，或是五分钱，正是一个火烧的价钱。对于一个小孩子来

说，在上学的路上吃一个热乎乎的火烧，该是怎样的福气。

1955年11月，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，我随母亲去了山东德州，户口也迁了去，1958年父亲响应国家发出的“干部家属下乡支援农业”的号召，又将母亲和我，还有三弟（在德州出生）送回老家。这时，爷爷已不开他的小颜料铺了，成了东关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市部主任，副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经过了公私合营运动，他的小铺合到公家的商店里去了。他因为有文化，成了县商业局的正式职工。只有每天早晨扫街面的习惯，仍保持着。只是我已长大了，不会在路过他跟前时，磨磨蹭蹭不想走了。当然，若学校要什么学习用品，或是缴什么费用，会堂堂正正地向他开口。爷爷呢，每次给钱的时候，总要多给上三毛两毛，算是给我点零花钱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写我的出生时间时，总愿意写作1946年。这是因为，写作1946年，我们弟兄四个的年龄，恰好是个平行四边形。

哥哥1944年生，比我大两岁，三弟1956年生，比四弟大两岁，哥哥比三弟大十二岁（同属猴），我比四弟大十二岁（同属狗）。两岁是那个短边，十二岁是那个长边，两个短边是斜的，不正好是个平行四边形吗？这是我初中二年级学了平行四边形的概念后，首先想到的。能想到这儿，可见我只是笨点，却不能说很笨。

再就是，只有这个扁长的平行四边形的队列，才有可能让我在“文革”爆发的前一年上了大学，同时也才有可能让我的两个弟弟在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还没有失去上大学的机会。我大舅有三个孩子，年龄恰在我与三弟之间，命运跟我们弟兄们就大为不同。

时耶，命耶？只能说时中也有命的成分吧。

五弟六弟出生要晚得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家庭，当时有八口人，就有三个挣工资的。哥哥工资不高，只能顾了他自己。而父亲和爷爷，合在一起当在一百二三十元。对一个多数成员在农村的家庭来说，应当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再就是，虽说家在农村，家庭里的成年男子，没有一个是务农的。说是一个富裕的家庭，有文化的家庭，该不为过吧。

是个富裕的家庭，有文化的家庭，却不能说是个幸福的家庭。一个巨大的阴影，正越来越近地，向这个家庭的头顶聚拢过来。

这就要说到我们家的成分，即家庭成分了。

成分这两个字，几十年了，我一直都弄不清楚该怎样写，也弄不清它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。不是装傻，是真的。是说这个家庭有某种成分吗？显然不是。是说整体上具备某种性质吗，也不是，似乎更注重历史。真的就是历史吗，也不完全是，同时也在说明着现时的什么。写到这里，我不放心，查了新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在“成”字下有这个词条，旁边又加了括号，里面是“成份”二字，也就是说，“成分”也可以写“成份”。有两个义项，第一是“指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的物质或因素”，举例是化学成分，营养成分，减轻了心里不安的成分。第二义项是“指个人早年主要经历或职业”，举例是工人成分，他的个人成分是学生。

再翻“家”字，并没有“家庭成分”这个词条。才过去二三十年，词典就教人忘记这一影响深巨的社会名词了。

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，一个没有富农分子的富农家庭。

实在说，当年我也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，

我家最初是军属。父亲转业后，每年到了队里分口粮的时候，常说“干部家属怎样怎样”，也就是说，我和我母亲，是干部家属，我们这个家的成分应当是干部呀。然而这是不允许的，父亲填家庭成分时，也得填富农。

最初让我意识到家庭成分可怕的，是初中毕业时的一件事。

毕业考过了，中考招生也考过了。一天傍晚，在我家门前，我妈与一位邻居大婶聊天。这位邻居大婶有个侄儿也参加了中考，说起可能到来的结果，邻居大婶很是自负地说，你们家的成分不好，若分数差不了多少，人家会要她那个侄儿，而不会要我。我妈回到家里，不住地叹气，我在灯下看书，没注意。我妈叫住我，说了她的担心，前一年我哥哥没有考上高中，今年要是我也考不上，那可如何是好。

“通知还没有下来，你怎么就说我考不上？”

“刚才我在门前，跟你婶婶说话，人家就说，要是分数差不多，肯定是要她家侄儿不会要你，咱们成分不好啊。”

一阵悲伤涌上心头。我知道邻居婶婶说的是实话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忽地一股悲壮之气涌上心头，扭身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是按成绩录取，录取一个也是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母亲惊喜异常。

“真的！”

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，只可说差不多，敢说这样大胆的话，纯粹是为了安慰母亲。

那一年的高考怎样，我不知道，知道的是，中考特别难。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，许多建设项目都下马了，中考招生规模也压缩到不能再压。中专不招生，中技不招生，中师（师范学校）

不招生。高中，一个县只招一个班。我的第一志愿，报的是康杰中学，当年晋南专区最好的一所高中。

没过几天，考试结果公布了。

临晋中学录取的肯定不会只有一个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

康杰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会只有一个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

考上高中，妈妈高兴，爷爷更高兴，妈妈高兴只是庆幸我有书念，她不知道考上康杰中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。爷爷的高兴就不同了，他知道考上康杰中学，就意味着往后上大学不用发愁了。因为我们那儿多少年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，就是考上康中，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。

爷爷的高兴，还有一重原因，大约 1923 年的时候，他曾上过康杰在运城办的河东中学。假定现在的康中就是彼时河东中学的延续的话，等于多少年后，孙儿继他之后进了同一所中学。

晚上，在院子里乘凉，爷爷给我说，康杰姓嘉，是夏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，留日学生。留日期间，与几个同学办学校，践行“教育救国”的理念。他们还在上学，怎么办？康杰想了个办法，今年回来四五个人，教一年书，明年去日本继续上学，另外四五个回来接替他们。后来惹恼了阎锡山政府，办了两年就停了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将自己家的地契烧了，发动民众，组织游击队，在中条山里坚持抗日。抗战胜利后，又领导武装斗争，因行事不慎，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。

又说，康杰口才极好，讲起课滔滔不绝，嘴边挂着白沫都顾不得擦一下。爷爷本来是要读下去的，但他哥哥弟弟接连去世，太爷爷无心用世，叫他辍学回来经管家务。爷爷回来后，一直在附近村子里当个小学教员，还当过编村村长，再后来就在街上开

颜料铺子了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不在家，我最为崇敬的就是爷爷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爷爷清瘦高挑，热天一身白布裤褂，走起路来有种飘逸的风度。爷爷不光风度好，性情好，还写得一手刚劲的柳体字，在我们这一带是很有名的。爷爷总是勉励我好好念书，用他的话说，是念到哪儿家里供到哪儿。

我不敢说爷爷从我身上看到了多大的希望，但我至少是实现了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求学的梦想。

就这样，我去了离家一百华里外的运城县，上了康杰中学的高中部。从此也就离开了韩家场。只有假期，才会回去。

那是1962年，我十五岁。几乎可以说，从这一年开始，我就离开了家乡，踏上了我人生的漫漫长途。

二、苦读

去运城，是跟荆冬娃、卫大鹏一起去的。冬娃是镇上教场庄人，大鹏是南连村人，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。后来冬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，大鹏考上西北大学。

那时运城还是个普通的县城，康中也不在现在的地方，在城内一条叫阜巷的街上，大门朝西，两个水泥门柱上，横跨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，上面四个红色的铸铁大字：康杰中学。

在教导处前的公告栏里，找见了分班的告示。四个班，排序是六十二到六十五，我跟冬娃分在六十二班，大鹏分在六十五班。过后才知道，这是历年来康中招生最少的一次，往常都是八个班，最少也是六个班，近十年来从没有只招四个班的。同时也知道了，

这次中考，临晋中学考得好极了，四个班共有二十二二人。往年从没有这样好的成绩，也就是两三名，顶多五名。

一个镇上的初级中学，何以会有这样好的成绩，当时我们并未深究，只以为是我们这一茬学生学习劲头足，又赶的运气好，才有这样的成果。

多少年后，我悟出此中的一点道理。说来或许让人不信，我的看法是，1957年的“反右派斗争”，对中国乡村教育有促进作用。只要这样问上一句就明白了此中的关联：那些“右派”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？因为有几个著名的“右派”去了黑龙江的农场（如丁玲、聂绀弩），或是新疆的农场（如王蒙、艾青），好多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了那些地方。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样重的处罚，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。去了那些地方，纯粹从事体力劳动的毕竟是少数。相当大的一部分，是将他们从研究机构、要害部门调了出来，分配到内地的乡村中学当了教员。

山西就是这样的内地省份。

临晋中学就是这样的乡村中学。

隐隐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着作用，越是“罪行重”的，越是往基层打发。而“右派”这种人物，“罪行”与能力常是成正比，这样分配到临晋中学的教员，是些何等样人物，也就不难想象了。

不必全面列举了。说上几个就行了。教过我们几何的龚维尧老师，江苏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航校的教官。教过我们物理的周彭安，是浙江绍兴人，原在某高校教书，我们甚至疑心他是鲁迅的本家呢。教过我们化学的吴惠畴，是江苏人，据说他每星期都要去集上买一只老母鸡炖了吃。教我们俄语的三个老师，全

是“右派”。冯祖华是江苏人，原在中央军委机要室任英语翻译；宿梦文，辽宁人，原是外交部的翻译，长的就像个外国人；阎杰，山西大学的高才生，早几年就该毕业了，因为“右派”问题严重，推迟毕业，我们去的那年才分配到临晋中学。

这些“右派”老师，不光教学认真，水平高，一般来说长得也排场，没有那种猥猥琐琐的。他们带给当地学生的，不光是知识，还有胸怀，做派，文明。

当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认识，只是觉得这些“右派”老师有本事，有风度，满口普通话，绝非本地教员可比。听他们讲课，有劲，过瘾。

康杰中学的老师队伍，却是另一种气象。名望更大些，人也更气派些。比如李道晔老师，三十几岁，气质高雅，雍容有度，人说是李鸿章的曾孙女。教我们代数的张保安老师，是“右派”，略微有些口吃，但数学之好，全地区闻名。教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，湖南石门县人，有过从军（旧军队）的经历，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官，解放后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，是康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。高三教我们俄语的李卓老师，闻喜人，黄埔九期学员，当过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上校团长，率部与日军打过几次硬仗。解放后，回到闻喜老家，跟上广播自学俄语，经考核后录用，成为康杰中学最好的外语教师。教我们的时候，年纪并不老，也就四十七八的样子。在这所中学，有军界经历的教员，不止唐老师、李老师，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，当过张学良的秘书，我在校时的副校长张襄国老师，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，少将军衔。

老师中，我最羡慕李卓老师的风度。不光是我，想来许多学生也是这样的。

李老师的军人风度，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。做什么事，都是卡着钟点，不迟不早，正好。钟声响着，走在去教室的途中，钟声一落，推门而入，分秒不差。一米八的个头，笔直的身板，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，蓝呢子马裤。黑色或棕色皮鞋，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。平日在校园里走过，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，膝盖略微抬起，小腿轻轻地甩出去。若是去食堂，手里端着饭盒，若是去教室，手里端着粉笔盒，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，端在他手里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重其事。我跟一位要好的同学，曾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，学来学去，怎么也不像，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。学了两天就泄了气，知道自己原本不是那块料。

康中的校园，是很有特色的，最大的特色该是宽阔、气派。教学区的地势高些，我们在的时候，还是旧式教室，一排一排，由北而南，中间是一条甬道。另有花园、康杰堂、教研楼等建筑。生活区的地势稍低些，面积是教学区的几倍，西边是老式宿舍，东边是新式宿舍，也是一排挨着一排，像兵营似的。东西宿舍之间，是大礼堂、灶房、篮球场。北边是大操场，有大门，里面有足球场，跑道。东南角还有一片农田，种的是小麦或玉茭。最南边有个自流井，终年流水哗哗，形成一条清澈的小渠，由南而北，绕过半个校园。

这样好的教员，这样好的校园，怎能不激发我们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，又怎能不膨胀我们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？

看看早上的情景，就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拼命学习了。

早上起床后，先是列队去大操场出操。人多，无法做广播体操，全是跑步，先是慢跑三圈，再是快跑一圈，最后用百米冲刺